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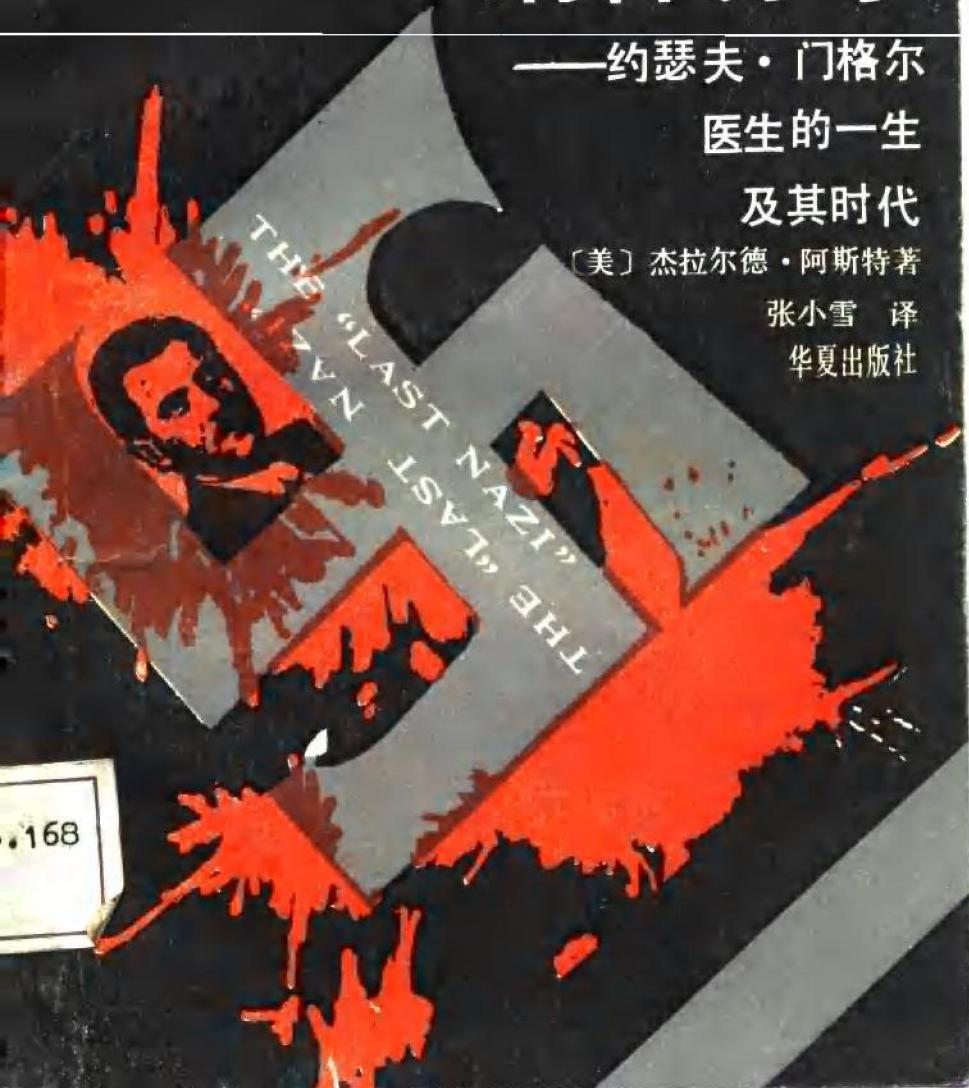
“最后一个” 纳粹分子

——约瑟夫·门格尔
医生的一生
及其时代

〔美〕杰拉尔德·阿斯特著

张小雪 译

华夏出版社



THE "LAST" NAZI
— THE LIFE AND TIMES OF DR. JOSEPH MENGELE
by
Gerald Astor
Donald I. Fine, Inc., New York, U.S.A., 1985

“最后一个”纳粹分子
——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

(美) 杰拉尔德·阿斯特 著
张小雪 译 丁钟华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头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193千字 插页1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200册
ISBN7-80053-105-8/K·008
书号：11484·008 定价：1.50元

1 3 1 4

献给遇难者与幸存者

译者序



运送毒气受害者的尸体到焚尸炉去的手推车。（见本书第61页）



在奥斯威辛铁路侧线上，在一个类似门格尔式的集中营医生的监督下，党卫队士兵把新到的犯人们分成男人和女人两个队伍。一般地来说，这些人中有百分之十到三十的人被归入适于干活的奴隶劳工的行列，剩下的人则立刻排队走向或被卡车运往毒气室。（见本书第52页）



这张照片是1956年
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的。门格尔把这张照片
贴在了由德国大使帮助
而获得的护照上。

(见本书第200页)



从恩布的坟中挖出
的头盖骨被X射线拍成
照片，然后与门格尔的
照片对在一起，从而证
实，那具残骸就是门格
尔的尸体。

(见本书第200页)

目 录

第一 章	幽 灵	(1)
第二 章	青年纳粹党人	(11)
第三 章	奥斯威辛——世界的粪门	(30)
第四 章	挑选人——决定犯人的生与死	(51)
第五 章	治病者	(71)
第六 章	科学家	(88)
第七 章	军医旗和卍字旗	(101)
第八 章	“好人” 和“恶魔”——双重性格	(122)
第九 章	出 逃	(137)
第十 章	阿根廷的赫尔穆特·格雷戈尔	(163)
第十一 章	传闻失实、制造假情报和几位名人	
		(180)
第十二 章	南美洲的纳粹主义气氛	(203)
第十三 章	佩德罗先生和巴西的阴谋集团	(211)
第十四 章	最后的岁月	(229)
第十五 章	暴 露	(242)
第十六 章	“最后一个” 纳粹分子	(268)

第一章 幽 灵

二百零八块人体各部位的骸骨，八颗牙齿，一些尸衣的碎片，当然还有一小撮碎骨——1985年6月间人们证实，这些东西显然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残骸。这个门格尔就是被人称为“死亡天使”、“灭绝营的安琪儿”、“死神医生”、“屠夫”的那个家伙。据调查，此人是六年多以前在巴西的伯蒂奥加海滩溺毙的。这些残骸是从巴西恩布的一座坟墓中掘出来的。从而，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轰动一时的悬赏缉拿案，就此告终结。

约瑟夫·门格尔的名字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恐怖的代名词。在这场大屠杀中，纳粹的杀人工具杀戮了六百万犹太人，消灭了成千上万不计其数的其他民族的人民。从事追捕战争罪犯的西蒙·维森塔尔在约瑟夫·门格尔的死讯传来之前，就曾宣布说：“他是从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死亡工厂中逃出的最后一个活着的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凶手。”就在他的尸体被人们从坟墓中挖掘出来的时候，悬赏缉拿约瑟夫·门格尔的赏格高达三百四十万美元。

约瑟夫·门格尔心狠手辣，十分歹毒。他所犯下的罪行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都是其他纳粹刽子手们望尘莫及的。“这个漂亮的魔鬼站在我们的面前，决定着人们的生死……他站在那里就象一个风度翩翩、潇洒可爱的舞蹈大师，在指挥着一场波洛涅兹舞。他的手或左或右、或右或左，漫

不经心地随便指点着。他的姿态轻松而优美，与周围丑恶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姿态似乎使我们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对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已感到无所谓了……他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或者鬼迷心窍？还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械人？不，他是一个杀人的行家，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恶魔……”

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名囚犯格雷特·萨鲁斯夫人所描绘的。萨鲁斯的丈夫和一家人都死于奥斯威辛。她所描述的“杀人行家”、“以杀人为乐的恶魔”就是指的约瑟夫·门格尔。门格尔是一名医生。他曾经把一名婴儿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几天后，他把婴儿送回来了，但是，孩子的一只眼睛已然变成了一个鲜血斑斑的可怕的大肉球。而这位医生竟然说：“差别就在于你能不能把蓝眼睛变黑。”

有一名犯人公然违抗他，声称自己不怕死。门格尔随即对一名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说：“这名犯人既然想死，那就把他枪毙算了。”于是，那个党卫队员就拔出手枪，将这名犯人杀害了。

约瑟夫·门格尔作为集中营的一名医生，他要会见新押送到集中营来的犯人。他总是一面悠然自得地打着飞指，轻轻地弹着他的手杖，笑容满面，说话和气；一面却宣布把一些人直接送往毒气室立即处死。被他这样杀害的人就有二十万到四十万之多。

对门格尔的起诉书中列举的具体罪行有枪杀和棍打犯人，而经他亲手注射化学试剂致死的就有十二人。一些在他手下幸免一死的人，也都落得肢残体缺，永远留下了在医药试验的幌子下受尽折磨的痕迹。

门格尔其人颇有才智，幽默中亦见刻薄。他竟恬不知耻地说：“他们来到这里时还是个犹太人，但走时却化为一股

青烟从烟囱里去了。”门格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名前同事坚持说：“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家伙。”“他的眼界非常开阔，为人非常风趣。”一名囚犯甚至把他誉为“美男子”；另一名犯人则夸他“很会体贴人”。一些吉普赛犯人还主动上前向他致意，叫他“父亲”、“老爹”、“大叔”。这位“衣冠楚楚”的约瑟夫·门格尔经常身着纯蓝色的衬衫，制服笔挺，混身散发着香皂的芬芳气味，站在那里审视着一行行肮脏憔悴、饥寒不堪、剃了光头的犯人，一一决定他们的生死。甚至当他谴责一些女犯人堕落无耻时，有一个年轻的妇女还说：“要是我能和漂亮的约瑟夫睡一觉该有多好！”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位犯人医生奥尔加·伦格耶尔在回忆与门格尔及其助手伊尔玛·格雷塞巡视的情景时说：“我感到很惊讶，他们居然这么漂亮，而且很有魅力。”格雷塞是一名党卫队的女看守。由于她对犯人极其残忍，罪行累累，英国人于1945年把她绞死了。

但是，约瑟夫·门格尔平时与犯人打交道，并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虐待狂。他不是那类靠自我奋斗从贫困中挣扎起来的下层社会的子弟。门格尔出身于一个富有而家教严厉的名门望族，又是家中备受宠爱的长子。他曾获得哲学博士的学位以及医生的开业执照。他爱好音乐，常常前来倾听格雷特·萨鲁斯对一些华丽乐章绘声绘色的描述。他读书很多，崇拜意大利诗人但丁。他在学术方面好奇猎异，因此他在同事中间是一位娓娓动听的健谈者，而且喜好搞一些医学方面的研究。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犯人们害怕他的那些研究，就象害怕他手中掌握的生杀大权一样。

犯人医生吉泽拉·佩尔说：“门格尔进行医学试验的诊所，就是那些被迫接受医药试验的人们的拷打所。”

纽约市立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医生说，门格尔的工作“显然是效法当时的物理人类学的一般做法”。

另一名犯人医生埃拉·林根斯对门格尔的研究工作嗤之以鼻地说：“他这个人就是信奉权力至上主义，他是一个地道道玩世不恭的家伙。”

奥尔加·伦格耶尔医生嘲笑门格尔说：“他搞的那套试验简直就象玩票。”

曾经与门格尔一起工作过的匈牙利犯人米克洛什·尼斯利医生，是一位病理学家。他说：“屋外林立着的焚尸炉烟囱里冒出的臭气熏天，而门格尔居然能够一门心思地俯身于显微镜下，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不管门格尔的工作性质如何，被监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吉泽拉·佩尔说：“我们大伙儿的性命全都攥在他的手心里，他的那双手权力极大，可以马上判我们的死刑，或者让我们多过几天这样的悲惨生活。”四十年后，佩尔说，她还时常白天、黑夜地做恶梦，担心门格尔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回来决定她的命运。

一位无名的犯人留下了一首诗：

我从黑夜的深渊中涌现出来，
就象一个万能的恶魔。
我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
能够带来无穷无尽的死亡。

门格尔的表现反复无常，令人费解。玛格达·巴丝是一

一个十七岁的罗马尼亚姑娘。她在1944年6月6日，即盟军在诺曼底滩头登陆的那一天，来到了奥斯威辛，她跌跌撞撞地下了火车。盟军登陆这一事件的全部意义，简直象是说，盟军连月球都能登上去。当时奥斯威辛火车站里一片混乱，手提扩音器里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喉音很重的命令声，巴丝和她的母亲试图听明白究竟说些什么，这时“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看得出，他是一位军官。他温和地问道：‘你们是姐妹俩？’

“‘不是的，’我的母亲回答说。‘我是她的母亲’。”这一短暂的相遇，使玛格达·巴丝和她的母亲幸免列入走向毒气室的死亡行列。后来巴丝受尽了门格尔试验的痛苦折磨，随后这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看见门格尔哈哈大笑。一群群的犯人被迫一行一行地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这种姿势难以坚持长久。卫兵们牵着德国大狼狗站在一旁。这些狗是受过训练的，只要听见拍手声和弹指声，或者听到喊‘犹太人！’就会冲到犯人中间去咬人。它们会从男女犯人身上咬下一块块的肉，撕得粉碎。门格尔却在一边哈哈大笑。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至今都不明白门格尔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

门格尔于1945年1月从奥斯威辛失踪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推动搜捕门格尔的工作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问题只是许许多多问题中的一个。对于一场大灾难的中心人物，总会有许多传说的。而当其他一些事件、狡猾的手段、时间以及所谓回忆的花招等，阴谋要把真相隐瞒起来时，传说就更多了。因此，关于集中营以及集中营的主管人物也是传说纷纭的。集中营中那些应当受到惩罚的管理人员，通过大规模屠杀和销毁档案的手段迫使绝大多数见证人无法作证。因而，门格尔的生平及其时代，简直成了一个事实与虚构的大

杂糅了，而且经过添枝加叶，其中又掺杂着回忆上的错误，头条新闻编造者的谎言，有关方面的蓄意歪曲，捕风捉影者提供的根本无法查证的说法，以及一些为国家大事出谋划策的人物所增增减减的不可告人的成份。

直到目前为止，关于门格尔的实际相貌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维森塔尔引用一项证词说：“门格尔是个小个子，皮肤黝黑，一头黑发。他的左眼有点斜视，上排门牙中间有一个三角形裂缝。”一名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女犯人，在四十年后却坚持说：“门格尔的个头高高的，皮肤白皙，头发淡黄，一双蓝眼睛。”有着这种错误印象的并不只是她一个人。一些记录和照片表明，门格尔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一百四十磅，棕色的眼睛略呈淡绿色，头发深褐色，上门牙中间有一处明显的隙缝。

关于门格尔，现在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所构成的形象，不只是一个人的形象，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形象。例如，门格尔在奥斯威辛的所作所为，除了谋杀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任何意图？他是否真的象所说的那样可怕？或者是否可以想象，他的那些无法无天的罪行是被人夸大了吗？他是否是一个人独行其事的吗？是否有什么人反对过他的行为？即便是在奥斯威辛灭绝营这样一个绝望的境地，是否有过某些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

在大屠杀的余烬尚未熄灭的时候，门格尔便溜之大吉了。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他的一个犹太情妇，偷偷地带他越过了苏联红军的战线，然后把他隐藏在欧洲的某些大城市里，一直到后来他得以逃出去，逃到离他犯罪的现场一万一千英里以外的地方。这种说法何以能够流传？它是否具有一些真实性？是否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效忠当地

的权贵，密约相率保持缄默，从而使他得以逍遙法外？或者说，他已被节节胜利的同盟国军队所抓获，只是由于当时人们的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而让他逃跑掉了？

这个从表面上来看曾经是一个通情达理而又十分有教养，从其以往的经历来看又可算一名专家的人，究竟受什么所驱使？如果一名精神病医生能够把他带到忏悔室去，那么他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他的临床诊断又是什么呢？他在性方面的表现如何？他结过两次婚，但是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工作时，就没有过什么好色淫荡的行为么？他的性欲对他的晚年生活有什么影响？

门格尔显然嗜好杀人。他的这种嗜好究竟怎么样了呢？在他浪迹天涯期间，这种嗜好是否就象腐烂的沼泽地里的恶臭一样紧紧地附在他的身上？他在离开欧洲以后，是否确实为别人私下堕胎？是否干过持枪格斗和杀人的勾当？他在伯蒂奥加海滩溺毙以前，就传说他已死亡，先后至少有五次之多。

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能够逃脱得了来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报复呢？又怎么能够躲过那些高度专业化、而且狡猾无比的秘密谍报机构的耳目呢？堂堂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为人称道的以色列谍报机关难道都如此无能？

是谁帮助门格尔隐藏起来的？谁在保护他？他是否是在一个技能高超的纳粹秘密组织的庇护下而逍遙法外？这里不妨举出三个组织，如令人畏惧的“敖德萨”、“蜘蛛”或“同志会”。是否有一个专门散布错误消息的情报网，故意地搅乱专职的和非专职的搜捕纳粹分子的侦查人员的视听？

现在，我们对于他的信念方面的问题有什么了解呢？不妨借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一句话的意思来说：“没有什

么东西比失败更能教育一个人了。”但是，失败究竟是使他的坚定信念受到动摇了呢，还是更加顽固起来？门格尔会因为自己的罪行而感到内疚吗？或者说，当他面对着虎口余生的怒不可遏的控诉者们的时候，还能够镇静自若吗？他在巴西的避难所中，对于世界、世界各国的领袖、各国的政府以及各国人民持何种态度？

在那伙为他提供庇护所的人们中间，他这么一个只要轻轻弹一下手指就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人，怎样学会了与他人亲密相处的？那些为他提供避难场所，与他结伴为伙的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是谁？

当门格尔的残骸在恩布被发现的消息刚刚传来时，曾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怀疑。但是，由十七名法医学、人类学、放射学、齿科学和笔迹分析等专家组成的国际调查组提出的报告说：“从科学判断的合理范围看，我们认为，这是约瑟夫·门格尔的遗骸。”后来，美国纽约亨廷顿研究所的法学齿科科学家洛厄尔·莱文医生补充说：“完全有可能，另外有一个人也具有这一切特征，而且毫无二致。”

以色列负责缉捕纳粹战争罪犯的警官麦那克姆·鲁塞克最初说，这是一个骗局。可是，他千里迢迢到正在检验那具残骸的圣保罗去了一趟之后，便逐渐相信，这具尸体确是约瑟夫·门格尔的。但以色列政府对于这个结论仍持保留态度。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埃利·维泽尔在仅仅两个月以前，呼吁美国总统里根，不要前去拜谒葬有纳粹党卫队队员的西德比特堡公墓时，曾特别提到门格尔。在以色列做出定论以前，埃利·维泽尔也不同意门格尔死亡的说法。西蒙·维森塔尔和另外两个侦缉纳粹分子的著名人士——塞尔日·克拉斯费尔德和比特·克拉斯费尔德夫妇，则赞同这些科学

家们的鉴定。

这些人所以持怀疑态度，是有其道理的。门格尔毕竟已经“死”过五次了。有许多次，人们的确发现门格尔藏匿在巴拉圭内地的某个遥远、偏僻而又戒备森严的庄园里。他怎么能够在圣保罗这种环境里，安安稳稳地住在一座小房子里呢？他的家人们为什么要把他的死亡隐瞒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里，他们还不断受到报界的滋扰；这个家族的生意，由于与门格尔这个人有牵连是否受到损害呢？

这个长期以来广为传播的惊险故事，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突然收场了，使得报纸、广播和电视记者们都感到上当了。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身受其害的人认为受了骗，他们一生遭受的痛苦清算无日了。他们渴望亲眼看到门格尔受到审判，这不仅仅是要他面对控诉他的人们，看看他的罪行所造成的结果，而且也是要他把大屠杀铭记在心，从而可以驳斥那些可恶的、声称大屠杀绝无此事的修正论者。

人们普遍认为，约瑟夫·门格尔是最后的一个纳粹分子。《洛杉矶时报》记者威廉·蒙塔尔班诺在他从圣保罗发回的一篇报道中说，或许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79年最终在伯蒂奥加海滩结束的。西蒙·维森塔尔曾经这样说过。他希望抓获门格尔从而使他追捕纳粹战争罪犯的工作得以圆满完成。鉴于门格尔死亡的证据累累，塞尔日·克拉斯费尔德说道：“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一切都完了。”这番话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要让大屠杀在人们头脑中记忆犹新，要使对纳粹残余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报纸、广播和电视的记者们可以把大屠杀及其后果抛置脑后，不再去想它，尽管政治家们为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以贯彻，认为纳粹主义好象在1979年即已灭亡；或者象里

限总统在拜谒比特堡公墓时所说的，参与纳粹恐怖活动的那些人至少可以说，几乎已全部死亡；但是，门格尔居然能够逃脱正义的惩罚达三十四年之久，其神通之广大不能不令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纳粹主义是否已经灭亡。这不只是原来的纳粹党卫队东山再起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小撮人企图恢复纳粹党活动的问题。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现在是否已基本上予以肃清，或者说，它仍然存在着，就象受到压抑的潜在的火种，在环境条件适宜时，就要喷发出来。人们是否能够从门格尔的一生中，从他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来变为一名逃犯的事实中，看出一点苗头，这种苗头无庸置疑地表明着，门格尔所独特代表的那个运动还在继续存在这个事实。

第二章 青年纳粹党人

京茨堡市位于斯图加特城和慕尼黑城之间，与两地距离大致相等。这一地区称为施瓦本，位于巴伐利亚的西南部。蜿蜒而下的京茨河在京茨堡汇入较大的多瑙河，向东奔腾而去，遂成为浩浩荡荡的多瑙河主流。

京茨堡的周围是地势平坦而肥沃的农田，种植着大片的油菜作物，它那象卷心菜般的叶子可以用来饲养牲畜。京茨堡市有一座古朴的大厦，犹如一座城堡。这里田园生活的宁静从来没有受过严重的干扰。在这片土地上看不到什么决战留下的痕迹，罗马教皇和各国君主也没有在这里达成什么政教协议，他们也没有用贡金在这里建造一座宏伟的教堂。从旅行指南图或书中往往找不到京茨堡。

京茨堡首届一指的家族无疑是门格尔家族。这个家族在施瓦本根深蒂固。约瑟夫·门格尔十七世纪的祖先是来自离京茨堡不远的赫希施泰特和吕青根的乡村。门格尔的祖父阿洛伊斯是当地人，他娶了特蕾西娅·迈尔为妻，在赫希施泰特烧砖为业，生意颇为兴隆，家财足以供养1884年出生的儿子卡尔攻取大学的学位。(约瑟夫·门格尔说他的父亲卡尔·门格尔出生于1884年，而其他的人则说是在1881年。)

1907年，卡尔·门格尔着手接管京茨堡的一家小型机械工厂，这家工厂始建于1872年，雇佣了七名工人，为当地农民生产脱粒机。作为所有者，卡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工棚上写